

馮乃超文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

馮乃超文集

李一氓



中山大学出版社

冯乃超文集

(上卷)

冯乃超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插页4 300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 10339·13 定价: (精)4.10元 (平)2.95元

永远怀念他的为人(代序)

丁 玲

我说过，我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有的人你可以和他相识几年、几十年，你从他那里却很难留下一个明晰、深刻、完整的印象。有的人虽然交往不多，关系不深，但却使你永远记得他的样子，永远怀念他的为人。冯乃超同志便是这样的人。他和我相处的时间很短，来往不多，谈不上深知；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那样的平和、正直、真诚、亲切。

我认识乃超是在一九三〇年，我到上海参加左联以后的事。那时他是左联党团书记；而我由于身体关系，很少参加活动，大部时间都在家写作。也频入党后，左联党组织的会，有时就在我们家开。我与乃超见面只是点点头。他们谈得热烈，我坐在一旁观察，很少发言。一九三〇年，也频被选为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的代表，年底要去江西苏区开会；我们计划两个人同去。但是，十一月八日刚出生的婴儿怎样安置？我想把他送到湖南老家，交给母亲；但去苏区的行期在即，时间来不及，我们正为此发愁。也频告诉我，乃超同志答应帮我们喂养孩子；他们自己也刚有一个婴孩，比我们的大几个月。这天晚上，我为此激动得不能安眠，我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同志感情，阶级战友之间的温暖。这种友情在旧社会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是得不到的，在利欲薰

心、见利忘义的所谓朋友之间也是不存在的。我对乃超同志的陌生感觉一下消失了，我只感到亲切、温暖、甜蜜、清新。不久，也频突遭不幸，苏区之行未能实现，孩子也就没有送到乃超家里，但这一珍贵友谊却成了永恒的记忆，牢记在我心中。后来，听说乃超因为工作忙迫，生活艰难，他的夫人声韵患了肺病，他们把自己的那个孩子不得不送回老家，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出生后的第七天便送给了一对南洋华侨夫妇。我可以想见，当初他们应允替我带孩子时，他们是准备承受多么重大的负担和牺牲啊。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的早晨，为了要去苏区，也频出门办事，约定中午回家。然而，中午过了，他没有回来。天黑了，灯亮了，仍不见他的身影。我神经紧张起来，预感到将发生什么不幸，不管我如何往好处想，都镇静不下来。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冲出了房门，在马路上狂奔。后来，我想到，乃超是左联的负责人，应该去找乃超。我跑到福煦路，望见义兴煤号的楼上，他们的房窗里透出淡淡的灯光。我先敲前门，再敲后门，都没有人应。我站在街上喊，他们听不见，后来房里的灯光也熄灭了。寒冬深夜，沿街的门户都紧闭着，路上没有行人。我痴痴地站在空荡的马路上，想着乃超和声韵那间温暖的小房，想着他们身边熟睡着的孩子。我想，给我孩子做棉被时，也要给他们的孩子做一条，他们的那条太小了……。第二天一清早，天不大亮，我又去找乃超。他让我进屋，劝我不要着急，就匆匆地带我去找雪峰。一路上都沉默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在沉默中，在同志的身边，我感到自己的苦痛和沉重似乎得到了分担。从雪峰那里，知道柔石已被捕，他们断定也频一定也出了问题。他们尽量安慰

我，说要想办法。但我知道，鹰犬环伺，他们自己每时每刻都有危险在等着。啊，那是个多么寒冷严酷的冬天啊！

这以后不久，乃超同志接替朱镜我，担任文委书记，接着又调去从事《红旗周报》的恢复工作。由于环境险恶和工作的机密，他和左联的许多同志都不发生联系。然而那年夏天，我们意外地碰面了。原来是《红旗周报》有同志被捕，组织上通知乃超夫妇立刻转移。声韵抱着孩子到江湾，乃超便来到法租界我家里躲了约半个月。有时声韵带着孩子来看他，也在这里住几天。乃超还利用这段时间赶译《芥川龙之介集》那本小说集，换点稿费，维持生计。三一年下半年，我开始编《北斗》，乃超也写文章托人带给我，他写的《新人张天翼的作品》评论，就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

一九三二年春乃超离开上海到武汉，我们没有再来往。

一九四八年冬天，我奉命出国参加世界妇女代表会议，途经大连。《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得了一笔稿费。我想把这钱寄到湖南，接济在家的寡母。但当时内战正酣，解放区与国统区不通邮，更不通汇。大连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乃超同志在中共南方局工作。真太好了，于是我托大连党组织把这笔钱带给乃超，请他转寄湖南。一九四九年春，乃超从香港回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夏天，我也从沈阳来到北平。这是胜利后的重逢，大家都很兴奋。阔别多年，我看他虽不再年轻，却也不显老，精明干练中仍透着一点腼腆，而且热情依旧。我们来不及互道辛劳，畅叙离情，我也没有来得及说一句感激的话，他却先从口袋里取出一支派克钢笔，说这是寄到湖南老家的那笔稿费的零头，他买了这支钢笔留给我写

作。我一下感到这支笔的份量。我和乃超同志的交往，都是这样的小事；但从这些小事，我却看到一个革命者的高尚品德。

我知道，乃超同志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创社造和鲁迅论争时，他是参与的一个。本来，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有了意见分歧，发生争论，这是常事。而在我和乃超同志的交往中，我时时感到他对鲁迅先生的尊重，感到他的坦率、明朗与开展，我从来也没有发现他存有什么偏仄成见或丝毫宗派情绪。他在我国新文艺事业创始的阶段就积极参加工作，创业有功，但他从不居功摆格，总说自己仅是个业余的文艺爱好者。人们是不会忘记冯乃超同志几十年来的辛苦和贡献的。新出版的这部《文集》就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都能从中获得教益。乃超同志那正直善良的形象，他对同志的真诚信任与真情关切，至今仍在温暖和鼓励着我，我要向他学习。

一九八五，十二，二十四，

于医院中

冯乃超传略

李 江

冯乃超，现代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革命活动家和教育家。曾用笔名、别名有：超，乃超，N.C.，公越，马公越，韬，子韬，冯子韬，公韬，冯公韬，仲堪，冯仲堪，李易水，洞冥，成奇，等等。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生于日本国横滨市。原籍广东省南海县盐步区秀水乡（今东秀乡）高村。

出身华侨资本家家庭，祖居日本。祖父冯德明，号紫珊，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和爱国热忱，赞助孙中山的革命，参加横滨兴中会，被选为干事；任横滨大同学校校董，是个有声望的侨领。他又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活动，当过《新民丛报》发行人，后来政治上倾向于保皇党。因与革命党人经常来往，家中藏有不少爱国志士避难时寄存的文史书刊。在横滨、神户、香港、广州等地开办印刷所，还与人合资经营一家贸易行，经济生活还算富裕。祖母冯庄氏。父亲冯瑞华，号月楼。母亲陈凤亭。冯乃超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二。在这种家庭环境熏陶下，从小养成了好学习习惯，孕育着爱国思想。

一九〇八年春，入横滨华侨开办的私立大同小学读书。翌年秋，随母亲携弟妹返广东南海故乡念私塾，从《三字经》读到《诗经》。在乡间有机会接触劳苦人民，并耳闻目睹辛亥革命前夕乡村爱国者慷慨悲歌的壮举，这给年幼的冯乃超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写诗歌《南海去》、小说《故乡》及回忆录《三十七年前的今天在香港》纪之。一九一一年九月，由于时局的变化，祖父将家人从家乡南海经广州、香港带回日本横滨。冯乃超先念了半年私塾，再入大同小学就读，前后共八年，成绩优秀，历任班长。小学时代开始翻阅家中收藏的《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浏览《三国演义》、《石头记》、《迦茵小传》、《花间集》、《词志》等中外小说和诗词，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开始练习写诗，绘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上发表过风景画。

一九一八年三月，在大同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横滨华侨与日英教会合办的志成中学读书。在一年多的教会学校生活中，冯乃超看见种族歧视的现象而十分反感，又接受了富国强兵的思想。同时受进步的国文教师朱我农(有昀)的影响，阅读《新青年》等杂志，开始接触中国新文化运动。次年五月，插班转入东京私立成城中学的中国留学生部三年级，半年毕业。一九二〇年三月，投考东京藏前高等工业学校未被录取。同年九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相当于高中)，与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同学。一九二一年九月毕业，考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本科理科甲类，准备将来学习采矿、冶金或地质。一九二三年九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家庭因此破产，富国强兵思想亦大受打击，对理工科失去兴趣，而把精力转向文学、哲学，耽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书刊，以及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外

国文学名著，并沉醉于西田几多郎所著《善的研究》。

一九二四年三月，在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听西田博士的课。冯乃超广泛阅读文学、哲学书籍，喜欢高蹈派、象征派的作品，如日译法国魏尔伦的诗集，比利时梅特林克的剧本《青鸟》，日本三木露风、北原白秋的诗集等。写诗较多，有唯美主义倾向，曾与李初梨、李亚依等编辑《涟漪》诗集手抄本一册，还结交了郑伯奇、李铁声等人。当时住在京都法善寺山下，附近有座清水寺，在晨钟暮鼓的陶冶下曾萌生了出世思想，向往三木在北海道修道院所过“沉默、祈祷、劳动”的生活。是年夏季，赴东京与堂叔冯子章往千叶县度假，开始厌恶虚无的“西田哲学”，力图摆脱这种苦闷孤寂的心境。一九二五年三月，接受朱镜我建议而离开死水般的京都，转学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但对所学课程仍缺乏兴趣。下半年在神田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认识穆木天，过从颇密，并谈诗。翌年一月，改学美学与美术史专业，选修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和考古学。在探索新诗创作中写出一批象征主义诗歌，后成诗集《红纱灯》，部分作品在《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从此与创造社发生关系，后成为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的联络人。这时，参加了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艺术研究会，从日文、德文书中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但也受到日本福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注意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接受过苏联和日本“左”倾文艺理论。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激起了留日进步学生的义愤，冯乃超曾几次赴京都参加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政治集会，并经彭康介绍，参加了潮音社。同年十月，成仿吾从上海赴日本东京。京都，约请冯乃超、朱镜我、

李初梨、彭康、李铁声等回国，参加创造社工作，商议创办一个文化思想刊物，宣传马列主义理论，鼓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冯乃超与朱镜我先回上海。下月，其他三人亦回国。这时，郑伯奇等早有联合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起新兴文学运动的打算，征得郭沫若同意，决定邀请鲁迅合作。鲁迅欣然答应，准备复刊《创造周报》。由于成仿吾及新回国几位同人另有计划，联合鲁迅一事终未实现。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镜我主编的《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共出五期，冯乃超协助编辑前三期。创刊号发表冯乃超的论文《艺术与社会生活》，对鲁迅等作了错误的评论，因而在进步文艺界中展开了一场历时半年多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同期发表诗两首《上海》、《与街上人》，标志着冯乃超诗风从颓废到革命的转变。同年四月，诗集《红纱灯》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初版，全书分八辑，共收诗歌四十三首，《序》中说：“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此书出后，反响较大，从而奠定他在诗坛的地位。七月，《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出版，从本期起至第二卷第六期由冯乃超负责编辑，内容进行革新，使纯文艺的杂志变成战斗的阵地。这期间，发表过《冷静的头脑》等文批判新月派梁实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九月，由潘汉年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央宣传部领导的文化党团（后称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十二月，受文化党团委托，与郑振铎、钱杏邨等筹组中国著作者协会，任监察委员，但不久即瓦解。本年编成革命诗集《今天的歌》，因书店被封而未能出版。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间，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华南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兼课。

一九二九年初，冯乃超担任文化党团的文艺组组长，后为“文委”委员。一月，短篇小说集《傀儡美人》由上海长风书店初版，共收小说九篇，《作者的话》写道：“这集里面所选出的依然不是不健康的小生命。”“送出我的过去，或许增加我前进的势力。”二月七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查封创造社出版部，创造社即以江南书店名义继续活动。九月，与李声韵结婚。十月，冯乃超化名马公越编著的《日本社会运动史》，由上海沪滨书局初版。秋，“文委”委派冯雪峰、冯乃超、钱杏邨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征求鲁迅意见，并确定以鲁迅为首的筹委会十二个基本构成成员。同时，冯乃超与郑伯奇、沈端先等成立了我党领导的艺术剧社，开办戏剧讲习班，冯乃超任该社文学部部长。十二月，短篇小说集《抚恤》由上海沪滨书局初版，共收小说十一篇，为《傀儡美人》的增订本。本年冬至次年春，冯乃超三次访问鲁迅，深受教益。在批判梁实秋的战斗中，鲁迅主动配合作战。本年编成戏剧集《县长》及《文艺评论集》，因书店被封而未能出版。

一九三〇年春，艺术剧社举行过两次公演，第二次演出了冯乃超和龚冰庐合作的五幕话剧《阿珍》。二月，与筹委会其他基本构成成员召开上海新文学运动者的讨论会，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决定由冯乃超起草“左联”的《理论纲领》。三月二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冯乃超等报告筹备经过，大会通过《理论纲领》，选定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为常务委员，冯乃超担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四月，冯乃超主编的《文艺讲座》第一册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主要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评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抄封艺术剧

社，捕去社员多人。接着，冯乃超主持“左联”第一次全体大会，作政治报告，分析国内外形势，总结两个月来“左联”的工作。五月，冯乃超负责编辑的《五一特刊》出版，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岗、罢操的示威运动。不久，又主持“左联”第二次全体大会，中心议题是“五卅”纪念示威和总结“左联”过去工作。八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左”倾决议。九月，与“左联”的柔石、冯雪峰等为鲁迅举办五十寿辰纪念会。十月，“左联”、“社联”、“剧联”、“美联”等团体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本年，译完伊立支(列宁)、蒲力汗诺夫等论托尔斯泰的文集《艺术与革命》以及《傅利采的托尔斯泰论》，但因故未出版。又与雪峰等合译《日本关于艺术价值的论战》，亦未见出版。

一九三一年初春，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等“左联”五位成员被捕遇害。二月，冯乃超接替朱镜我任“文委”书记兼“文总”书记，“左联”党团书记由冯雪峰继任。三月四日，江南书店等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本月，因中共中央《红旗周报》遭受严重破坏，冯乃超被调去从事恢复工作，建立印刷所，负责技术编辑，收集日文、英文报纸和《国际劳动通讯》，担任校对，从此离开“左联”和“文委”。七月，《红旗周报》主编罗绮园被捕，冯乃超避居丁玲家中，译《芥川龙之介集》，不久化名冯子韬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共收小说四篇，及译者前言《芥川龙之介的作品作风和艺术观》一篇。

一九三二年三月，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潘汉年派冯乃超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李书城属下任事，利用岳父李书城的社会关系化名隐蔽下来，以国家保卫局(“特科”)成员身份，为党

做情报工作。冯赴武汉后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帮办秘书。次年初，李书城调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冯亦调往民政厅，任第三科第二股股长，掌管统计与“党务”工作。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与文化界抗日救亡人士接触，用真实姓名发表诗文。九月，发表《诗歌的宣言》，重新为战斗的生活而歌唱。接着，与孔罗荪、蒋锡金创办《战斗》旬刊，又任《战斗画报》周刊前七期文字编辑，宣传抗日。十二月，组织武汉文化界抗敌工作团，任出版组组长。年底，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何伟接上党的组织关系，转到长江局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时辞去湖北省民政厅职务。

一九三八年一月开始，冯乃超参与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任筹备委员，负责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三月二十七日，“文协”在武汉正式成立，通过了《简章》，被选为理事。四月一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亦在武汉正式成立，郭沫若任厅长，冯乃超任第七处第三科科长，主管对敌（日）宣传，编辑《敌情研究》，进行日文制作，并协助日人鹿地亘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工作。五月，“文协”会刊《抗战文艺》创刊，任编委。六月，我党在三厅秘密成立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管理党员的学习生活，兼管孩子剧团党小组工作。七月，三厅举办献金救亡活动，掀起献金狂潮，负责整理献金账目，两月后编印成《征信录》一册。九月，“文协”总会迁往重庆，即与孔罗荪等创办《抗战文艺》“武汉特刊”，发表《加强保卫大武汉的斗争——论本刊的使命》。接着随前线慰劳团往北战场第五战区浠水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后来据此写成抗战回忆片断《浠水前线》。十月十九日，代表“文协”出席在武汉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

念会，并作发言。本月二十一日，与三厅人员离开武汉，撤退长沙。十一月十二日深夜长沙大火，便经衡阳赴桂林。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冯乃超撰写社论，批判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在桂林期间，曾与鹿地亘举办日语宣传训练班。五月五日，离桂赴重庆。在赖家桥与杜国庠负责三厅郊外办公室日常工作，常去曾家岩向周恩来请示汇报，先后两次击退政治部强迫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的暗潮。

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党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第三厅，郭沫若为首集体辞职。蒋介石阴谋提出“离厅不离部”，下月三十日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冯乃超任“文工会”党内书记，敌情研究组组长，协助鹿地研究室工作，继续进行合法斗争。次年一月，国民党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冯乃超与徐冰组织“文工会”及孩子剧团部分人员疏散，并直接领导孩子剧团。三月，被选为“文协”第三届在渝理事。十一月十六日，参加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作《发聩震聋的雷霆——纪念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创作生活》。一九四二年前后，中共南方局宣传部成立“文委”，徐冰任书记，冯乃超与夏衍等任委员。此后多次组织文艺界人士学习讨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评错误的文艺观点。一九四五年二月，与郭沫若等三百一十二人联名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三月三十日，蒋介石指令政治部解散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五月，冯乃超被选为“文协”组织组副主任。八月，任茅盾文艺奖金评选委员。

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由延安飞往重庆，冯乃超参与该团工

作，任顾问。一九四六年一月，任中共南方局统战委员会文化组副组长，参加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三月，欢送鹿地亘夫妇及反战同志回日本，作《欢送鹿地亘先生》。五月，离渝赴上海，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工作。任上海“工委”委员、“文委”书记。六月间，曾与郭沫若赴南京参加促进国共和平谈判的工作。十月底，离沪赴香港，任香港华南分局“工委”委员，与邵荃麟等负责审查在港文化界部分党员的政历，解决组织关系。

一九四七年初，香港华南分局“工委”领导成立“文委”，夏衍任书记，委员有冯乃超、邵荃麟、胡绳等。冯乃超继夏衍之后担任“文委”书记，主管香港文化工作。二月，任全国“文协”港粤分会主办的香港文艺学院讲师。四月，任香港文艺生活社文学顾问会理论指导。六月，为纪念瞿秋白就义十二周年，冯乃超编辑瞿秋白的《论中国文学革命》，并撰《后记》，七月由香港海洋书屋初版。

一九四八年元旦，发表与邵荃麟共同执笔的《方言问题论争总结》。二月，为宣传解放区的革命诗歌，冯乃超编辑艾青等的诗集《毛泽东颂》，并撰《编后记》，下月由香港海洋书屋初版。三月，与邵荃麟等编辑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共出六辑，后印成《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创刊号发表冯乃超的《战斗诗歌的动向》等文。五月，发表《评〈我的两家房东〉》，介绍解放区的小说。同月被选为全国“文协”港粤分会理事。七月，发表论文《从〈白毛女〉的演出看中国新歌剧的方向》，高度评价解放区的戏剧。本年编成论文集《论人民的文艺》及《新文学运动简史》，未印出。

一九四九年三月，冯乃超率领二百多名文化界人士离香港赴

解放区，经天津到达解放不久的北平。即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工作。被选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下月，任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七月，以南方代表第一团副团长身份，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任党组代表成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大会期间任章程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议理事，兼任联络部副部长。九月，以华南军区代表团代表资格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十月，在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处长，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处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党委书记。次年十一、十二月间，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任我国代表团副秘书长。

一九五一年二月起，冯乃超离北京赴广州，历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山大学院系调整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山大学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中山大学分会书记，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广东省委员会副主席，至一九六五年。其间，曾出国访问，任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秘书长；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大”代表；曾作《友谊的旅程》，《重读〈俘虏的生还〉记》等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冯乃超受到冲击和批斗，几年后始获“解放”。一九七二年六月，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七五年四月底，调离中山大学，赴京养病和工作。十月初，任北京图书馆顾问。这期间，多次接待鲁迅著作注释组、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访问，并修订、撰写回忆录《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